

原文: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014, vol. 39, no. 2

© 201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 塔里亚·梅·贝彻尔 (Talia Mae Bettcher)

译者: 許顥頊 (they/them/祂/TA) ¹

摘要 (Abstract) 在这篇文章中, 我为一种不同于主流跨性别模型的跨儿压迫和反抗的解释论述进行辩护。虽然我说明了为什么“被困在错误的身体里”模型和跨性别模型都有问题, 但我也阐明了前者如何被视为一种反抗性的叙述。新的论述有两个关键观点。首先, 我借鉴 María Lugones 的工作, 为多重意义模型辩护, 认为传统的解释论述假定了占主导性的意义, 而排除了具有反抗性的意义。其次, 我从最近对将跨儿者作为欺骗者的恐跨表征进行论述的文献中得出结论, 认为现实强制 (reality enforcement) 是占主导地位的做性别 (doing gender) 之方式的重要后果。而传统的错身叙述 (wrong-body narrative) 可以被看作是对现实强制进行反抗。

被困在错误的理论里: 反思跨儿压迫和反抗²

Trapped in the Wrong Theory: Rethinking Trans Oppression and Resistance

¹ 对本译文的几点说明: 1. 绝大部分文中出现的人名将会保留原文, 以保留阅读的顺畅, 并且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 (词汇、结构等) 为主要方式; 2. “trans”一词将译为“跨儿”或“跨性/别” (这个翻译在本译文中不一定会出现)、“trans people”翻译为“跨儿者”、“transphobia”译为“跨儿恐惧”或“恐跨”、“transsexual”将译为“跨性” (本译文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 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文被引入时, 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儿与非二元者社群中视为具有贬损色彩的词汇), 而“transgender”译为“跨性别”, 读者在阅读时需要仔细思考这几种论述模型的差异; 3. “female”只译为“女性”, “woman”译为“女人”、“女”, “male”与“man”的翻译则对应, 以此类推, “trans woman”译为“跨儿女人”、“trans man”译为“跨儿男人”; 4. 本译文中“identity”译为“身份”、“认同”或者“身份认同”, “identification”译为“身份认同”、“sex”译为“性”、“gender”只译为“性别”; 5. 读者需要注意原文出版的时间点是2014年, 从当时至现在, 伴随着酷儿-跨儿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知识生产, 不仅新生了许多新的词汇, 同时一些术语含义和政治策略也在不断地被推翻重组 (例如最近围绕着“womxn”一词的事件; 或者是, “祂”字作为性别中立代名词的使用, 并对应为“they/them”的单数指称意义的翻译)。——译注

² 特别感谢一位匿名的审稿人, 其对早期草稿的尖锐批评帮助这篇文章转化为一篇更深刻的文章。

反抗几乎从来都没有一个直接的公共在场（public presence）。它不如说是两面三刀的（duplicitous）、模棱两可的（ambiguous），甚至阴险狡诈的（devious）。但它几乎总是被用以拥护和构成统治支配的意义结构所掩盖和隐藏。

——María Lugones（2003年，第x页）。

当我在90年代中期开始过渡（transition）³时，我几乎是拼命地搜寻适合我的故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需要一个故事来确保我对女人身份（womanhood）的声明

（claims），并阐明我的（经常是混乱的）生活经验。还能怎样证明我的声明？还能怎样理解我的经历？不幸的是，当时真的只有两个故事可供我借鉴。唉，现在仍然只有两个故事可以借鉴。

在我所说的“错身（wrong-body）”模型中，跨性（transsexuality）涉及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与性化身体（sexed body）之间的错位（misalignment）。这个观点是在性学（sexology）、医学和精神医学（psychiatry）的脉络下发展起来的（在技术发展的促进下）⁴。在该模型的心理变体（psychological variant）中，跨性被医疗机构（medical establishment）视为是一个心理问题（尽管其认为可以通过性再指派手术治疗（sex reassignment surgery）⁵），而在严格意义上的错身模型中，跨性则被跨性者视为是一个身体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错身模型有两个版本。在弱版本中，一个人生来就有跨性的医疗状况，然后通过生殖器重建手术（genital reconstruction surgery），成为（*becomes*）女人或男人（与天生的性别身份认同保持完全一致）。在强版本中，一个人真正的性（sex）是由性别身份认同决定的。在这个原生身份认同（native identity）的基础上，一个人以此肯定（affirms）自己一直都是自己声称的女人或男人。在这两个版本中，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被困在错误身体里”的男人或女人。⁶

³ 此处指“性/别过渡”，读者需注意，不能将“transition”唯一理解成药物过渡或进行相关的手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过渡方式（跨儿出柜也是一种过渡）。——译注

⁴ 见 Meyerowitz（2002年，第14-50页）。

⁵ 也可称为，“gender reassignment surgery（性别再指派手术）”，也有部分人使用较不涵盖的词汇“genital reconstruction surgery（生殖器重建手术）”。但当前更常使用的总体名称为“性别肯定手术”（gender confirmation surgery）。——译注

⁶ 见 Rubin（2003年，第150-51页）。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个新的故事也开始出现。Sandy Stone（1991年）的开拓性工作催生了跨儿研究（trans studies），Leslie Feinberg（1993年）和 Kate Bornstein（1994年）则为新的跨性别政治（transgender politics）奠定了基础。跨儿者（trans people）第一次为自己理论化自己。这一新的愿景见证了“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个词的引入，作为一个广泛的涵盖性术语——将性别越轨者（gender deviant people）（包括跨性者（transsexuals）、易装者（cross-dressers）、扮装皇后和国王（drag queens and kings）等等）聚集在一起。这样一来，这是一个面对针对那些非规范性别的（gender nonnormative）人们的敌意时，旨在团结的故事。这一新的愿景赞同一种“超越二元论（beyond the binary）”模型。它声称，由于跨性别者并不完全属于男人（man）和女人（woman）这两个二分对立的范畴（dichotomous categories），因此存在着企图将TA们强行归入这个二元论体制（binary system）的行为。在这一论述（account）中，对跨性（transsexuality）的医学管制，是社会试图抹除跨性别者的主要方式之一。⁷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对错身论述感到深深的怀疑。一方面，我不喜欢它病理化的一面。然而，我也担心新的论述。在我生命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在二元论的位置很有问题。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让我感到舒适的（*well*）是被承认为是女人。对这两种模型满怀矛盾情绪的我，仅仅在洛杉矶积极行动的跨儿亚文化（activist trans subcultures）中找到友谊和爱。在那里，我们发展了感到更加安全健康的过性别的替代方式（alternative ways of living gender）。而且一旦我完全沉浸在这些文化中，替代论述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不过，许多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有动力去提供一个真正让我满意的论述。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后，我对真正由我自己的生活/生命（life）提供信息的故事很感兴趣，因为它在地方性的跨儿亚文化中被赋予了意义。我渴望有一个能捕捉到我自己的现实以及我所选择的家人们、朋友们和爱人们的现实（reality）的论述——一个建立在我在跨儿社群中的经验、我的地方性知识基础上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我开始发展这个论述。要说明的是，我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好论述。我当然也不会声称它是普遍适用的（universally applicable）。然而，我确实认为这个故事有一些用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越过一些艰难的政治僵局。那么，在我开始这个论述之前，我将勾勒出一些关键问题。

⁷ 这个论述诚然是简化了的。

什么是利害攸关的？（What's at stake?）

尽管跨性别范式（transgender paradigm）在跨儿研究和跨儿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至少在英美圈子里是这样），但仍有一些思想家对这一特定愿景提出了严重担忧。Jay Prosser（1998年）、Henry Rubin（2003年）和 Viviane K. Namaste（2005年）都以各自的方式担心它不能准确地捕捉到跨性者的真实情形（the realities of transsexual people）。⁸其中一个担忧是，跨性别范式声称致力于性别是一种单纯的文化建构的观点，这与跨性者的实际经验相悖，因为对TA们来说，性别身份认同似乎不受文化改变（cultural modification）的影响（Prosser 1998年，第7页）。⁹另一个担忧则是，该模型提供的政治愿景并没有给那些自我身份认同不超越二元论的跨儿者（trans people）留下空间。许多跨儿者认为自己是男人和女人（see themselves as men and women）。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个超越二元论模型（the beyond-the-binary model）暗示了这些人是错误的（即，它使TA们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站不住脚）。最好的情况则是，它接受这些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fications），但同时承认它们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否定了生活在反抗压迫式二元论之中的跨儿生命（trans lives）的反抗力量（Namaste, 2005年，第7页）。

这些担心在政治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跨性”现在可以作为一种方式，与跨性别模型所清晰表达的政治愿景保持距离并加以反对。例如，最近在美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跨性分离主义（transsexual separatism）的声音，主要是在线上社交网站和博客上。在这种政治观点中，跨性者——尤其是那些接受过生殖器重建并选择不公开自己的跨儿历史（trans history）的人——认为自己未达成共识就被归入到跨性别保护伞下，且被错误地与性别非规范者（如易装者）【gender nonnormative people (such as cross-dressers)】联系在一起。¹⁰其次，虽然超越二元论模型总是被援引为跨性别政治的根本政治愿景，但许多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的人也自我认同为男人和女人。因此，出现了诸如“性别酷儿（genderqueer）”等这样的范畴，以捕捉那些实际在生活中强烈反对二元论的人，而“跨儿*（trans*）”的使用不仅包括那些身份认同为男人和为女人的跨儿，也包括那些身份认同不在

⁸ 见 Namaste 关于跨性别模型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论点（2005年，第103-26页）。

⁹ 见 Salamon（2010年）就建构论（constructionism）对于原生论（nativism）的反对所提出的有力辩护。以及 Julia Serano（2007年，第82-83页）提出的一种原生论观点。

¹⁰ 这种观点的例子见 Cooke（2007年）。

这两个范畴的跨儿。讽刺意味十分明显。“跨性别”最初是被用作为对“超越二元论”的人的涵盖性术语，但是在“跨性别”这一范畴下进行政治工作的自我身份认同为跨性别男和跨性别女的人的主导地位，要求对超越二元论这一愿景进行新的迭代（iteration）。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所援引的理论与实际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目前的情况是，跨性别政治有时会同时诉诸于超越二元论模型和错身模型。虽然后者原本不是政治性的，但它可以摆脱其病理化的一面，从而作为一种大致类同于能力政治（a politics of ability）的政治的基础：有些人在身份认同和身体之间具有一致性

（congruence）（如顺性者（cissexuals）），而另一些人则没有（do not）或曾没有（did not）（如跨性者），但社会世界是根据使前者享有特权的方式建构的。¹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错身模型无法确保跨儿（trans）声称属于某个特定的性（sex）的有效性。这对该模型来说尤其糟糕，因为这正是它标榜要保护的。细想下与性决定（sex determination）相关的特征的多样性：染色体、生殖器、性腺、激素水平、繁殖能力以及等等。为了说一位跨性者（在生殖器重建手术之后）经历了“性转（sex change）”，我们必须不考虑其它特征，包括染色体，而选择生殖器作为决定性标准（definitive）。但是，考虑一个具有XY染色体组型（karyotype）、并且在形态上是女性（morphologically female）（由于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complete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的人。这个人男性（male）还是女性（female）在这看来并不是清晰的。实际上，似乎没有事实基础（factual basis）可以用来仲裁这个问题。但手术后的跨性（postoperative transsexuality）似乎完全是类同的（analogous）。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人属于什么性或者什么性别而言，并没有实际事实。一种说法就是，一个生殖器手术后的跨性女人，其实（讽刺地）在二元论上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可以说，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应该尊重自我身份认同的主张。但，由于决定严肃对待她的自我身份认同，所以生殖器手术后的跨儿被接纳到女人这个范畴中，这样的最好情况是极少的。除此之外，她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男性和女性的边界了。

¹¹ Serano（2007年）为这一观点辩护（第166页）。她的理论通过诉诸“潜意识的性（subconscious sex）”、以及性和性别多样性（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的“固有倾向（intrinsic inclination）”模型，融合了这两种模型（第99-100页）【也就是超越二元论模型和错身模型，译注】。

强版本论述中的情况更糟糕。跨性女人在生殖器重建手术前是否真正地 (*really*) 是女性或女人，这远非是明确清晰的。这种说法是基于一种观点，即一个天生的身份 (*innate identity*) 决定着一个人所属的性 (*sex*)。然而，在性指派 (*sex assignment*) 的问题上，这样的特征是不是应该凌驾于其它所有特征之上也不是明确清晰的。同样的，对于——身体 (生殖器、性腺等) 有缺陷而内在的自我意识没有缺陷——这一观点来说，也没有明确清晰的论证。为何不按照心理学变体 (*psychological variant*) 的主张，认为性别身份认同反而才是有问题的呢？为何不避免说出任何事情都是错的呢？事实是，在接受生殖器重建手术之前的跨性女人很可能会被视为真正的男人，至少在许多主流语境中是这样。¹²

我所要强调的是，跨性者声称属于某一种性 (*sex*) 的主张似乎并不具有形而上学上的合理正当性 (*metaphysically justified*)：这些主张是，就性范畴成员资格 (*sex membership*) 和性别化待遇 (*gendered treatment*) 的问题而言，自我身份认同应该是决定性的 (*definitive*)。它们因此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问题在于，没有潜在的政治愿景来维持 (*sustain*) 对决定性的自我身份认同 (*definitive self-identities*) 的支持。超越二元论模型并不能维持自我身份认同的中心地位，或者说，至少它并非以——将这一举动视为是在政治上值得称道的 (*politically laudable*) ——的方式来维持，因为在这种模型中，真正的反抗立场，是要从超越二元论的立场提出挑战。而错身模型，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同样是失败的。因此，我想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提供这一举动的政治基础？我们如何强调它是面对压迫的一种反抗性主张？

提供这样一个支撑 (*undergirding*) 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二个原因，即清晰表述一种跨儿女性主义 (*transfeminism*) 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着重于性歧视 (*sexist*) 和恐跨压迫 (*transphobic oppression*) 的交叉性 (*intersections*) 的政治。问题在于，无论是超越二元论模型还是错身模型，都没有提供一种方法将跨儿女人 (*trans women*) 理论化为是以完全混合的方式遭受到性压迫 (作为女人) 以及恐跨压迫 (作为跨儿)。一旦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people*) 被视为是经由二元论的错误强加而遭受压迫，那么跨性女人 (*transsexual woman*) 如何能被视为是作为一个女人而遭受压迫，就不是清晰明确的了

¹² 比起文章篇幅所可以容纳的，此处仍有许多观点可以给出，特别是考虑到对间性人 (*intersexual individuals*) 的公众认可 (*public recognition*) (特别是在体育运动中)。

（因为【在这个模型下】她“超越了二元论”），更不用说遭受某种混合了对女人的压迫以及对跨儿者（trans people）的压迫的方式了。¹³

相比之下，错身论述可能可以解释一个跨儿女人如何作为女人以及跨儿而遭受压迫。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它的理论承诺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一个天生的性别身份认同的诉诸在一个女性主义论述（feminist account）中是很难容忍（abide）的。许多女性主义者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女人”这个术语陈述了一个社会群体、地位或角色。Simone de Beauvoir 曾著名地写道，“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一个女人。没有任何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决定着人类女性（human female）在社会中所呈现的形象；是整个文明创造了这种生物。”（1952年，第201页）。如果 Beauvoir 是对的，那么性别身份认同就不能是天生的（innate）。

细想下这个类比：既然宾戈游戏（bingo）和宾戈玩家都是文化创造物（cultural creations），那么如何严肃对待一个人作为宾戈玩家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是天生的这一观点呢？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可能（这是可以想象的）有天生的技能，这技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宾戈玩家（而且大概也会擅长玩类似的游戏）。但将自己视为宾戈玩家的概念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宾戈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这在性别方面也是如此。并且鉴于“女人”这个社会范畴一直被用来压迫人类女性（human female persons），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一种假设原生性别身份认同（native gender identity）的观点会有问题的，因为它将性歧视性质的文化现象（sexist cultural phenomena）自然化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人声称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这两个范畴不是文化建构的，那么，将一种天生的自我意识假设为男性或女性（the positing of an innate sense of self as male or female）就不会呈现出这种困难。我们可以通过部署内部身体形象（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性化的本体感受意识（sexed proprioceptive awareness））这一概念来提供这个观点一些合理性（plausibility）。这就是 Prosser 所采取的策略。然而，Anne Fausto-Sterling（2000年）等女性主义学者对性（sex）的社会建构也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所以，即使是诉诸于一种作为男性或女性的原生自我意识，也会有很大的麻烦。事实上，认为跨性者不是女人（women）和男人（men）而是在错误的身体里的女性（female）和男性（male）——这个观点在一半程度上似乎是相当微妙的（too subtle by half）。当然，大多

¹³ 关于不同版本的跨儿女性主义，见 Koyama（2003年）和 Serano（2007年）。

数跨性者认同为 (identify as) 男性或女性的同时，也一样认同为男人或女人。这一点尤其尖锐，因为在平常话语中，性和性别术语常常被互换着使用。

因此，我所捍卫的理论，除了为跨儿者们 (trans people) 声称属于一个特定的二元论范畴的主张提供政治支撑外，还旨在促进为对跨儿的压迫 (trans oppression) 和对女人的压迫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进行真正的交织论述 (intermeshing account)。这将使我能够对错身论述 (the wrong-body account) 进行批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虽然传统的错身论述做出了一种政治姿态，帮助确保跨性身份属于一个特定的二元论范畴，但它这样做的方式却助长了它所反对的压迫。展示这一点应该有助于澄清为什么我所概述的新模型是理解跨儿者自我身份认同中固有的反抗的更好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男人和女人的跨儿。

思考跨儿 (Thinking trans)

我所认识的跨儿者，大多数认同为男人或女人，或者是跨儿男人或跨儿女人。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接受过生殖器重建手术，我们中的许多人也不想做；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做过，一些人想做。我们中的一些人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手术改变了我们的身体（有些人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服用激素（有些人没有），我们中的一些人注射了硅胶（有些人没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殖器配置构造 (genital configurations) 并不会破坏关于我们是谁的事实。例如，我们中的一些跨儿女人非常清楚，我们明确地完全地是女人（甚至是女性），同时坚决否定任何对生殖器重建手术的兴趣。与之相比，我们中的一些人根本不认同自己是男人或女人，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跨儿女人”解释为实际上超越二元论的人。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 (self-identifications) 一般都很复杂并且很难确定。事实上，性别术语的意义本身并不是稳定的。它们既是多变的又是有争议的。

因此，当一个跨儿女人说“我是个女人”，而她的身体恰恰是那种被用来推翻女人身份 (womanhood) 这一主张 (claim) 的身体 (在主流文化中) 时，这一主张在一些跨儿亚文化中是正确的，因为“女人”这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它的意义本身就处在争论之中 (Bettcher 2012年b)。事实上，在一些跨儿亚文化中，跨儿女人可以被视为典范女人 (paradigmatic women)，而不是被视为只是在最低限度上是女人 (即，在男性和女性的边界上)。这种争论不仅仅是言语上的 (verbal)，因为它追踪着潜在性别实践中的对比：在有些情况下，一个跨儿女人可能作为女人过着富有而有活力的生活，作为女人有着朋友，

作为女人被爱着，居住在一个她是女人的社会环境（milieu）中（在跨儿亚文化中），也可能作为女人经历着性暴力，但同时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中被视为作为女人生活的男人。例如，在那种文化中，如果她被监禁，她会作为一个男人被关进监狱，和其它男人关在一起；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生活可能被抹除。我是从 María Lugones 的“多重的意义世界

（multiple worlds of sense）”概念来理解的：

世界全都是活的（lived）并且它们把社会（the social）组织成异质的、多重的。我认为社会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ely）以各种紧张的（tense）方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力量都在发生冲突，在任何世界的建构过程中产生着不同的重大影响。任何世界都是紧张的，不仅是在于紧张的内在纷乱中，而且也是在于紧张的承认或不承认的

（acknowledged or unacknowledged）与其它世界的争论中。我认为，有着许多世界，不是自主的，而是在语义上和物质上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充分地自我连贯的逻辑和充分地与其它世界相矛盾的逻辑，以构成社会的一种替代性建构（an altern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一个特定的世界是否不再存有，是一个政治争论

（political contestation）的问题。没有一个世界是原子式的（atomic）或是自主式的（autonomous）。许多世界都位于与其它世界的权力关系中，这其中包括二阶意义（a second order of meaning）。（Lugones 2003年，第21页）

我们可以在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的反抗关系中理解一个跨儿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受到争论的部分是替代性的性别实践（包括性别术语的语义）。¹⁴ 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与多种主导世界相对应的多种跨儿世界。

一旦我们采用 Lugones 式框架来理解跨儿压迫和反抗，我们就可以看到错身方法和跨性别方法（the wrong-body and transgender approaches）中固有的一个严重问题：它们将性别术语的主流¹⁵意义视为理所当然，从而排除了多重反抗性意义（multiply resistant meanings）的可能性（Bettcher, 2012年b）。在超越二元论模型中，说跨儿者相对于二元论而言是边缘化的，就是把TA们定位在主流理解下的“男人”和“女人”范畴中。如果跨儿身体可以有不同的反抗性意义，那么决定说这些身体是“混合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恰恰是假

¹⁴ 关于这一点，见 Hale（1997年）。

¹⁵ “dominant”在文中翻译为“主流”或者“占主导地位”。——译注

定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阐释。所以，问题不在于二元范畴的刚性僵化（rigidity），而在于首先就假定了只有一种阐释（占主导地位的阐释）的这个起点。同样，在错身模型中，要想成为女人或男人，就需要通过生殖器重建手术来纠正错误。但这是接受了对什么是男人或女人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跨儿框定在 Lugones 式模型中，我们也能够允许多种形式的压迫和反抗的交织缠结（intermeshing）。例如，并不能保证英语性别术语只需要有英语意义。在讲西班牙语的跨儿女人居住的世界中使用和流传的“跨性别”一词，可以有一个二阶（西班牙语）意义（a second order (Spanish) meaning），承认并反抗支撑这个术语的英语语言主导地位。这样的考虑涉及到试图谈论这些有时可能相互交叉的压迫的各种形式或轴心（axes）的尝试：只要属于不同的压迫和反抗的模态形式（modalities）（如“女人”、“跨儿”、“有色人种”）的表达方式本身在其它所称的压迫的轴心上遭受在意义上的争论，那么定式一个意义这一企图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权力的姿态。将对女人的压迫与对跨儿者的压迫分开来，这排除了“女人”在跨儿压迫和反抗的维度上遭受到的政治争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谈论不同形式的压迫，尤其是可以谈论不同形式的跨儿压迫。我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抽象的压迫载体（vectors）上，这些载体只能以宽泛的身份范畴（比如“女人”或“跨儿”）来定义，我关注的是恐跨暴力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制度化的形式。虽然它不是唯一的恐跨暴力之形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不能简化为性歧视（sexist）或种族主义形式的暴力，尽管它基本上与这些形式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最近的文献越来越多地关注一种特殊形式的跨儿恐惧，在这恐跨形式中，跨儿者被视为“欺骗者（deceivers）”——那些试图假装自己是自己不是的事物的人（people who try to pretend they are something they are not）。我在其它地方区分了两种对跨儿者的表征（Bettcher 2006年a）：作为欺骗者（那些被发现“实际上是男人或女人”、“掩饰伪装成（disguised）女人或男人”的人）和作为冒充者（pretenders）（那些已经被承认为是跨儿同时被视为只是在参与一种冒充（pretense）的人）。同样地，Julia Serano（2007年，第36页）对比了两种跨儿女人的媒体表征——“性化的欺骗者（the sexualized deceiver）”和“可悲的跨性者（the pathetic transsexual）”（穿裙子的可笑男人）。

我的论述是普遍性的（general），应用于跨儿男人和跨儿女人，而 Serano 的论述则特别侧重于跨儿女人。这两种论述共同指出了一种在跨儿女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的普遍现

象。Kristen Schilt 和 Laurel Westbrook (2009年) 的研究结果强调了这种性别不对称 (gender asymmetry)。Westbrook 在对——人们“被描述为做性别 (doing gender)，以便可能被视为与TA们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 (gender) 不同的性别”——的232起故意杀人案媒体报道的分析中发现，在56%的案件中，报道者都“将暴力刻画为是私人的性互动 (sexual interactions) 造成的，即行凶者感觉被‘性别欺骗者 (gender deceivers)’‘诡骗 (tricked)’进同性恋 (homosexuality)” (Schilt and Westbrook, 2009年, 第452页)，同时，全部案件中95%的案件涉及到非跨儿男人 (nontrans man) 谋杀跨儿女人。然而，Schilt 在对工作场所的跨儿男人的研究中也发现，虽然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接受跨儿男人为男人，但“在性化的情况 (sexualized situations) 下，女人将跨儿男人描绘成欺骗性的——不具有必要的男人身份的生物学标志 (biological marker of manhood)，诡骗女人进入看似异性的关系” (Schilt 和 Westbrook, 2009年, 第450页)。虽然欺骗者式表征 (the deceiver representation) 应用于跨儿男人和跨儿女人两者，但它以更极端的各种方式应用于跨儿女人。

由于绝大多数被杀害的跨儿女人是跨儿有色人种女人 (trans women of color)、贫困的跨儿女人、以及跨儿女人性工作，因此，仅仅关注在纵横性别差异 (across gender differences) 的恐跨暴力是不够的：种族和阶级同样必须成为中心 (Namaste 2005年；Bettcher 2006年a；MacKenzie and Marcel 2009年)。例如，Gordene MacKenzie 和 Mary Marcel (2009年) 强调了媒体对美国 Deborah Forte、Chanelle Pickett、Rita Hester 和 Gwen Araujo 谋杀案报道的种族主义的特征：“通常 [有色人种女人] 被刻画得比TA们的白人同行 (white counterparts) 更具异域性 (exotic)、野性、引起欲望 (desirable) 以及失控” (第84页)。

在我们对这种类型的跨儿恐惧的理解中，性工作这一角色也必须被视为占据着特殊角色。例如，Bella Evangelista 和 Chanel Larkin 在客户或潜在客户得知TA们的跨性别状态 (transgender status) 时被谋杀 (O'Bryan, 2005年；Erbentraut, 2010年)。Tooru Nemoto 和他的合著者利用焦点小组数据 (focus group data)，列举了“与被‘发现’为是跨性别有关的 [对跨儿性工作者而言的] 普遍安全问题” (Nemoto et al. 2004年, 第729页)。正如一位研究受访者所说：“没有人会杀男同性恋者，如果其在他两腿之间发现了一根屌

(dick)。没有人会杀女同性恋者，如果其发现了阴门 (pussy)。但是，TA们肯定会用刀子刺穿变性人 (tranny)¹⁶的喉咙，如果TA们看到乳房和屁。”(第729页)。

除此之外，Vek Lewis 还展示了欺骗者式表征如何在拉丁美洲语境中运作：“类似的修辞在将**异装喜好 (travestismo)**¹⁷或易装 (cross-dressing) 作为精心设计的骗局

(charade) 或诡计 (ruse) 这样的铭文 (inscription) 中运作。虽然这种修辞经常在美国和拉美语境中运作，但是，从历史上看，与犯罪性 (criminality) 的关联在拉丁美洲特别强烈” (2008年，第12-13页)。Lewis 由此强调了理解这种跨儿恐惧的特定文化情境置身性 (cultural situatedness) 的必要性。

然而，我自己的立场是独特的，我使用欺骗者式表征 (the deceiver representation) 来重新思考 (在主流文化中) 做性别 (doing gender) 这一概念本身。在我的观点中，性别呈现代表着生殖器状态 (gender presentation represents genital status) (Bettcher 2007年，第53页)。或者，就像我现在所说的那样，服装化的 (clothed) 性别呈现代表着通过委婉的手段 (euphemistic means) 进行赤裸的 (naked) 性别呈现 (Bettcher 2012年a，第329-30页)。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衣服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隐藏身体。然而，恰恰是通过这种隐藏 (concealment)，生殖器状态才得以被披露敞开。

当公共性别呈现和私有生殖器被解释为是不一致时 (construed as misaligned)，这种表征关系 (representational relation) 就为我所说的现实强制 (reality enforcement) (这是一种跨儿恐惧的基本类型，其为欺骗者式表征奠定着基础) 提供了条件。虽然与现实强制相关的特征有很多，但它有四个根本特征：身份认同无效化 (identity invalidation)、外表-现实对比 (the appearance-reality contrast)、欺骗者-冒充者双重束缚 (the deceiver-pretender double bind) 和生殖器验证 (genital verification)。身份认同无效化是指通过相反对立的范畴化来抹除跨儿者的性别身份认同 (例如，一个跨儿者认为自己是女

¹⁶ 此处，用“变性人”这一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翻译“tranny”这个咒骂词汇。但是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两个词本身都有被重新利用 (reclaim)，夺回主动出击意义的一面的可能。——译注

¹⁷ 原文为西班牙语“travestismo”，即英文“Transvestism”，译者译为“异装喜好”，这翻译可推，“transvestite”译为异装喜好 (者) 等。此处引用译者 (豆瓣，2021年2月14日译文) 在另一篇翻译中的说明：【译者拒绝“transvestites”的广传翻译“异装癖/异装癖人士”，“癖”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显然是贬低的，且“transvestites”一词已在英文语境下重新寻得了主动出击的面向，所以使用“异装喜好/异装喜好者”这一翻译。但读者也需要明白服饰本身的文化含义的演变，并且其不一定需要和二元对立的、分离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有关联，尽管如此，任何服饰总会被感受认知为 (perceived) 从属于某一范畴。】——译注

人，但她被范畴化为男人）。这种无效化被框定在外表-现实对比上（例如，一个跨儿女人可能被表现描绘为（represented as）“实际上是一个伪装成女人的男人”）。而这种对比显现在对跨儿者构成双重束缚的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即，过关（passing）成非跨儿者（nontrans）（因此冒着被暴露为是欺骗者的风险），或者是，公开为跨儿者（因此被贬（relegated）为纯粹冒充者）。生殖器验证可以理解为是字面意义上的暴露（exposure）（如 Brandon Teena、Gwen Araujo 和 Angie Zapata 【等人所遭受的】），也可以是通过“被发现是解剖学上的男性”等委婉评论所进行的话语性揭示（discursive reveal）。”这些揭露（disclosures）将身份认同无效化锚定在——生殖器作为一种隐藏的现实（concealed reality）——这样的概念中。

虽然现实强制似乎只影响到没有做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儿者，但它也会影响到那些做了手术的人。根据 Harold Garfinkel（1967年）的观点，关于性的常识性民间观点（即“自然的（natural）”这一态度）在性质上是道德式的（is moral in nature）（第122页）。生殖器被看作是合法所有物（legitimate possessions），这使得有资格的人们有可能谈论缺席的生殖器（absent genitalia）（127）。例如，一个在事故中失去生殖器的男人，可以谈论他本应拥有的阴茎。同样，跨儿者通过手术构造的生殖器也能被恐跨地视为（transphobically viewed as）与自然所期望要求（nature intended）的生殖器不一致。为了抓住这个观点，我使用了“道德式生殖器（moral genitalia）”和“道德式性（moral sex）”这两种表达。那么，我的论点是，公共性别呈现委婉地传达了道德式生殖器。通常情况下，道德式生殖器是实际的生殖器，但也可以是自然所期望要求的缺席的生殖器。这样一来，生殖器术后的跨儿者也会遭受到现实强制（reality enforcement）。

我的论点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背离了其它一些在民族学方法论传统（ethnomethodological tradition）中的性别理论。Suzanne Kessler 和 Wendy McKenna（1978年）试图在 Garfinkel 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文化式生殖器（cultural genitalia）”的概念（第154页）。这个概念比 Garfinkel 的概念更广泛，不仅包括道德式生殖器，还包括个人仅仅被假定拥有的生殖器。这种扩展与TA们的论点是有必然联系的，即人们通过将性别范畴归赋于TA们的过程而成为男人和女人（第13页），而性别归赋（gender attribution）实质上就是生殖器归赋（第154页）。之所以能够将假定式生殖器和道德式生殖器结合起来（the conjunction of presumed and moral genitalia），是因为TA们声称性别归赋几乎不可能

被推翻 (17)。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现实强制现象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TA们的说法是真的，现实强制就不会如此频繁地发生。也不会成为跨儿者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威胁。

所以，我们需要在隐藏 (concealment) 的情况下区分被归赋的——实际的道德式生殖器 (通常是隐藏的) 以及仅仅被假定的道德式生殖器。这对 Candace West 和 Don H. Zimmerman (1987年) 的经典论述有影响，该论述借鉴了 Kessler 和 McKenna 的工作 (132)。West 和 Zimmerman 区分了基于生物学标准 (包括生殖器) 而分配的性 (sex)，以及，基于“做性别”而分配的性范畴 (sex category) (第127页)。后者涉及到一种性别展示 (gender display) ——为了被归类为女人或男人而按照特定方式表现行事，也就是说，要对某一套规范负责 (第135页)。虽然TA们坚持认为性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是作为一种性的代理 (proxy for sex)，但TA们的性概念 (notion of sex) 是一般式生物学概念 (generically biological one) (第127页)。相比之下，性范畴的概念，就像早先的文化式生殖器概念一样，本应该做的是 Garfinkel 的道德式性的概念 (notion of moral sex) 的工作，但实际上是把假定式性和道德式性 (presumed sex and moral sex) 结合在一起 (West and Zimmerman 1987年，第131-32页)。

促使这一步 (move) 得以实现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实际的生殖器式性 (genital sex) 与日常生活中的性别 (gender) 谈判几乎毫无关系 (West and Zimmerman 1987年，第132页)。但对于跨儿者来说，现实强制的风险 (包括生殖器验证) 很肯定是日常生活结构的一部分。所以，West 和 Zimmerman 所理论化的日常生活并不是跨儿者的生活。一旦我们把现实强制 (reality enforcement) 嵌入到日常性别实践的语境中，我们就会认识到，道德式性 (moral sex) 不应该与公开外表 (public appearance) 结合，而应该与隐藏的私人身体 (private body) 结合。也就是说，性本身在根本上就是道德的，而性范畴不过是委婉地展示的或仅仅是表象的道德式性 (moral sex)。那么，做性别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一套性别化规范 (gendered norms) 的问责 (accountability) 管理；而是一个人隐藏的道德式 (生殖器式) 性【moral (genital) sex】的委婉展示。

最关键的是，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经常被隐藏的道德式生殖器 (moral genitalia)，因为它们认为隐藏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这两个文本中都承认了隐藏生殖器的惯例，但绝不是理论化了的。并且日常中生殖器确实被暴露的情境 (生殖器验证、性关系、公

共更衣室、集体住房、脱衣搜查) 一般都被省略。因此, TA们没有理论化的是隐藏和暴露的道德特征。因为生殖器验证——一种很明显的隐私侵犯——肯定是一种性虐待 (sexual abuse)。这一点需要被承认, 然后被理论化。

在我看来, 解释道德式生殖器 (以及普遍的自然态度) 的东西是身体受制于隐私和体面的性差异化 (sex-differential) 边界——对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本身来说至关重要的边界 (Bettcher, 2012年a)。例如, 女性 (female) 乳头受制于感观入径 (sensory access) 的边界, 而男性乳头则没有。虽然男人看到女人 (woman) 的生殖器可能构成对她的隐私侵犯, 但女人看到男人的生殖器可能涉及到他的猥亵犯罪。这些差异化的边界结构产生了私密自我呈现 (intimate self-presentation) 的两种性差异化形式——也就是赤身裸体的两种性差异化形式 (男性和女性), 并与公共性别呈现 (public gender presentation) 的两种性差异化形式 (the two sex-differentiated forms) 形成了对比 (第326页)。

关键是, 我的论述将现实强制 (包括其性虐待的性质) 作为跨儿者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加以阐释, 而早先的民族学方法论式论述则未能做到这一点。而一旦现实强制的基础被放置 (situated) 在性别上, 被理解为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情境化的 (situated)、相互作用的 (interactional) 成就 (accomplishment), 这就会像 Candace West 和 Sarah Fenstermaker (1995年) 所提出的那样, 我们更容易发现种族、阶级和其它压迫 (作为情境化的、相互作用的成就) 是如何内在于相同实践中, 并从而产生同步 (simultaneous) 且完全整合的 (wholly integrated) 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经验。例如, 我曾在其它地方论证过, 公共性别呈现在显露传达私密生殖器方面的功能是一个更大的非言语 (nonverbal)、非知情合意的 (nonconsensual) 交流系统的一部分, 并且这个系统促使着 (异性的) 性操纵 [(hetero)sexual manipulation]。女性性别行为呈现 (Female gender behavior presentation) 有时具有传达性兴趣 (sexual interest) 的功能 (不管女人自己的实际意图如何), 而正是通过如此, 生殖器性 (genital sex) 由此被暴露传达。对跨儿女人来说, 这可能会产生多重束缚的场景: “一方面, 选择隐身 (invisibility) 和充当 (passing) 为非跨儿出现, 可能要求MTF (男跨女者) 在跟异性性存在 (heterosexual sexuality) 的日常谈判中, 采取通常而言编码着‘是的, 对的’的 (‘yes’-encoded) 性别呈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可能会使MTF们面临着‘被暴露为欺骗者’以及恐跨暴力的危险。然而, 成功地采取了这种呈现方式, 也可能会增加性监察 (sexual scrutiny) 以及实际的性互动 (sexual interaction) 两者

的可能性，并因此再次使MTFs面临着‘被暴露为欺骗者’的危险”。（Bettcher, 2006年b, 第207页）。在这种情况下，跨儿女人将同时经历标准的性操纵以及潜在的跨儿恐惧，而这两者又是同步（simultaneous）且完全整合的（wholly integrated）。

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指出在差异中反复出现的现实强制的基要特征。固然有色人种跨儿女人确实是最经常遭受到极端暴力行为的群体，被认为是性欺骗者，但这不应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白人跨儿男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不会遭受到恐跨的极端行为（例如，想想 Brandon Teena）。事实上，正如 Schilt 的工作所展现的那样，许多人遭受到不那么极端的变化形式（Schilt and Westbrook, 2009年）。虽然需要把这些差异作为中心，但关注结构上的相似性（similitude）仍然是迫切必要的。忽视相似性将意味着忽视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暴力的运作的更大图景。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层次地解释论述这种跨儿恐惧的形式是如何在各种差异中不同程度地分布着的（differentially distributed across multiple differences）。

由于最极端的现实强制事例往往发生在压迫的最大交织处，我认为这些事例应该被理解为是范式性的（paradigmatic）。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些事例中发现了其它常见的相关联特征（察觉发现的性化语境（sexualized context of discovery）、性暴力、谋杀、指责受害者）。所以，对现实强制的解释论述应该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它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暴力、性歧视暴力、恐跨暴力和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全部同时发生在一起的实例化

（instantiation）（大致沿用我上文讨论里，对于跨儿女人事例中现实强制与性操纵两者相结合情况的解释）。通过确定在各差异中的共同结构特征，我们可以勾勒出恐跨暴力的轨迹：随着现实强制的变化形式（variations）远离范式事例，它们将趋向于失去一些共同的相关联特征，从而变得不那么严重或不太可能变得严重。既然现实强制可以理解为一种跨越种族、阶级、文化和性别差异的不同暴力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一种不能被简化为是性歧视（sexism）、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的暴力形式，同时其在根本上与这三者交织在一起。

虽然我不认为现实强制是跨儿者受压迫的唯一方式，但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值得认真对待。首先，鉴于现实强制的条件固有地存在于性别成就（accomplishment）本身中，因此充当（为非跨儿者）【passing as nontrans】就与现实强制密切相关。在这种观点中，以充当通过为女人（To pass as a woman），就是成功地传达了自己在生殖器上是女性（genitally female）。因此，也难怪在许多跨儿者的生活中，充当通过（passing）会是一

个如此紧迫且处处渗透的问题。是否充当通过的问题其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欺骗者-冒充者的束缚。换句话说，充当通过的压力本身，部分是由于不想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冒充者而产生的。当然，充当通过本身也充满着对可能被发现（potential discovery）（或“被标记察觉（getting clocked）”）的担忧。这些担心在约会的情境下尤其紧迫（当潜在的约会对象不知道自己跨儿时）。

其次，现实强制是当人们被认为从事了性别非规范（gender-nonnormative）行为时出现的跨儿恐惧的先决条件（precondition）。如果一个人遭受到歧视或暴力是因为这个人被认为违反了性别规范（也许是因为这个人正穿着裙子），这无疑是因为这个人正被恐跨地看作（transphobically viewed）是一个男人。但如果这个人视自己为女人，那么她就不会认为自己违反了性别规范。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被认定违反了某项规范，首先需要将这个人阐释为受到该规范的约束，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而人们普遍都是以TA们的道德式性（their moral sex）为基础，认为自己要受到性别规范的约束。因此，现实强制是——被视为规则违反者这一情况——的先决条件。当然，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对跨儿者的歧视会导致各种毁灭性的物质后果。例如，最近的研究“处处不公（Injustice at Every Turn）”发现，在全部受访者（全都是跨儿）中，90%的受访者报告说在工作场所受到歧视，受访者生活在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households）中的可能性几乎是非跨儿者的四倍，71%的受访者“试图通过隐藏自己的性别或性别过渡（gender transition）来避免歧视”（Grant, Mottet, and Tanis, 2011年）。最后一个发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强调了充当通过（passing）在跨儿者生活中的作用，并表明歧视的前提（predicated）是被以特定方式阐释。

第三，现实强制是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这一点可以通过细想各种形式的性隔离（sex segregation）发现——包括公共厕所和更衣室、家庭暴力庇护所、游民庇护所（homeless shelters）、共用的医院房间、看守所和监狱（jails and prisons），以及强制警察和其它保全人员执行同性搜查（same-sex searches）这样的政策，都体现了这点。在所有的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现实强制与性侵害（sexual violation）的融合。考虑到这种隔离的基本道德动机往往是为了保护女人免受侵犯隐私和（由男人实施的）猥亵犯罪之害。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呼吁这种道德动机），当跨儿女人根据被感知到的生殖器状态（perceived genital status）而被安置隔离（housed）时，她们就遭受到了这侵犯隐私以

及猥亵犯罪的侵害本身。对跨儿女人来说，性隔离导致了边界侵犯的情况（boundary violations）且边界侵犯是身份强制（identity enforcement）的组成部分。

最后，试图回击现实强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威胁，可能会导致跨儿者将自己置于伤害之中。一些跨儿女人可能会为了证明自己的女人身份（womanhood）而停留在虐待式关系（abusive relationships）中，一些跨儿男人可能会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而做出虐待行为。例如，研究已表明，一些跨儿女人可能会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包括与顾客和主要伴侣），以确保作为女人的有效认可（validation），从而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风险（Nemoto 等人，2004年）。此外，在跨儿女人群体中，以谁更“真实（real）”为标准来划分等级秩序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等级秩序可以建立在手术改造、达到某种美的标准、或能够充当通过的能力（ability to pass）的基础上。不幸的是，这样的行为会导致我们以不好的方式对待彼此——甚至是暴力。

即便如此，虽然现实强制显然是跨儿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它并不适合超越二元论模型（the beyond-the-binary model）。不仅许多现实强制的受害者被身份认同为男人或女人，而且犯罪者也将受害者视为女人或男人，且外表-现实对比（appearance-reality contrast）同样位于二元论之内（“实际上是一个男人打扮成一个女人”）。所以，这种跨儿恐惧并不涉及超越二元论之外的任何东西；它涉及的是某人在二元论中的位置。（将此与跨儿者被当作为“它的（its）”而不予理会的情况相对比，在这样的情况中似乎确实涉及到被认为是二元论之外的人）。这种形式的暴力，与其说是过于僵硬的性别边界消除了那些绝对感觉阈限的（categorically liminal）人的后果，不如说其是与外表（appearance）、错觉（illusion）、发现（discovery）、现实（reality）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正是这个框架才可以让我们看到错身叙述对跨儿压迫的反抗。

在错身叙述中的反抗（Resistance in the wrong-body narrative）

考虑到性别身份认同是天生的这一观点与性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理论主张相对立。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建构主义在现实强制方面可能会格外刺耳：如果跨儿者有系统地遭受到欺骗或冒充的指控，那么性和性别是建构物（constructs）的这一想法似乎看起来会是特别危险的。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可以回答说，每个人的性和性别都是一种建构——这种说法并不只是针

对跨儿们 (trans folk) 而言。但是这就忽略了跨儿者被建构为建构物 (constructed as constructions) 的独特方式。

细想看：如果整个世界是一个我们各自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 (we all play a part) 的舞台，那么跨儿个体就在扮演演员 (play actors)。对于因被建构为演员而感到沮丧的人来说，仅仅声称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演员，其本身就会抹去一个人被特意地建构为演员所遭受到独特性与压迫性方式 (distinctive and oppressive way)；它不会对破坏被特意建构为演员这一情况提供任何帮助；而是它会加强一个人确实是演员的说法，同时掩盖了这种加强 (reinforcement) 正在被制造的事实。

有人可能会回答说，称某一事物是被建构的，并不意味着称其是不真实的。宾戈游戏虽然是社会建构的，但也是存在的。然而，鉴于性和性别最初被当作是自然之物 (as natural)，建构主义暴露出它们实际上是人为之物 (as artificial)。这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建构之物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和生物给定之物 (the biologically given) 之间的区别；而且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把自己伪装成自然之物的社会建构，一种欺诈性的

(fraudulent) 社会建构。正是这种表征，考虑到现实强制，会是特别令人担忧的。这种担忧，只有当跨性别现象被用作论证工具 (argumentative tools)，以表明性和性别是以这种欺骗性的方式建构的，或者更糟糕的，当跨儿者被简化成 (are reduced to) 这种误导性建构 (misleading construction) 的比喻 (tropes) 时，才会加重 (见Namaste 2000年)。很难相信这样的使用最终不是以跨儿者作为欺骗者或冒充者的表征为代价。

这似乎使跨性政治 (transsexual politics) 和女性主义政治相互对立，一个群体想自然化 (naturalize)，另一个群体想去自然化 (denaturalize)。而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自然化 (naturalizing) 的努力违背了跨儿女人作为女人的利益，因此从跨儿女性主义的

(transfeminist) 角度来看是很有问题的。然而，这个错误在于只关注从其它压迫形式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压迫形式 (modality)。错身论述就成为了这种困境的牺牲品。为了反抗将其简化为纯粹冒充，一些跨儿者肯定了一种基于——诉诸于天生的性别身份认同——的现实。虽然这种肯定 (affirmation) 是对跨儿压迫的回应，但它通过将性歧视式性别差异自然化 (naturalizing sexist gender differences) 从而削弱了 (undercuts) 跨儿女人。

这解决办法的一部分是支持一种承认跨儿压迫和反抗的不可简化性 (nonreducibility) 的建构主义。特别是，这种理论应该承认，跨儿者被建构为欺诈者

(frauds) 同时一些跨儿者通过诉诸于性别实在性 (gender realness) 来对此回应。这就需要区分实际的反抗行为和阐明这种反抗的理论这两者。虽然实际的反抗行为可能会诉诸于性别实在性 (并使用一种理论来辩解这种实在性), 但是, 一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可以用来阐明这种手法策略 (maneuver) 并且其理论本身并不致力于这种性别的实在性。此外, 虽然必须从跨儿女性主义的角度拒绝对原生性别的实际诉诸, 但必须极为严肃地对待社会构成的对实在性的否定 (socially constituted denial of realness)。事实上, 这一理论必须确认和阐明对现实否定的反抗的策略 (tactics of resistance to the denial of reality), 避免从多重压迫中抽离出来。

除此以外, 强版本的错身叙述 (the wrong-body narrative) 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极大地扭转了对实在性 (realness) 的否定。现实强制说“那人其实是个女人, 只是穿成了男人”, 而错身叙述则会说“那人其实是个男人, 只是被误导性的身体伪装了 (disguised by a misleading body)”。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外表-现实对比 (appearance-reality contrast) ——要么是性别呈现与性化身体 (sexed body) 之间的对比, 要么是性化身体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对比。一旦置于这个语境中, “我真的是个女人” (由身份认同决定) 的这个身份主张 (identity claim), 可以被看作是对“你真的是个男人” (由生殖器决定) 的主张的直接争论质疑。这是从隐藏的生殖器到隐藏的身份认同的转移 (shift)。通过这种转移, 欺骗和冒充的指责被削弱了。性别呈现的背后是一具性化的身体。但性化的身体背后是性化的身份认同 (sexed identity)。所以, 虽然人们可能会说性别呈现错误表述了 (misrepresents) 性化的身体, 但事实证明, 性化的身体实际上错误表述了一个隐藏得更深的身份: 一个在呈现的背后——的身体——背后的身份 (an identity behind a body behind a presentation)。这结果就是两种错误表征 (misrepresentations) 的相互抵消, 而性别呈现 (gender presentation) 原来正确地表述了 (represent) 一个人本来就有的性化身体。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这样一种观点, 即认为认可这种叙述的跨儿者不过是认可了关于性的自然态度 (natural attitude about sex) (Garfinkel 1967)。虽然这样的跨儿者确实是在有效地宣称一种道德式性 (moral sex), 以便将TA们实际的生殖器视为是不合理的 (illegitimate) 并以此谈论TA们有资格拥有的生殖器, 同时TA们也在对实在性的否定 (the denial of realness), 这种否定来自于公共性别呈现和亲密呈现 (intimate presentation) 之

间的表征关系 (representational relation) ——这种关系本身正是自然态度的基础。通过这种逆转, 关于性别 (gender) 的所谓真相 (一个人的裸体) 变得不过是一种误导性的外表 (misleading appearance), 而隐藏的身份现在则是道德式性的确切位点 (the locus of moral sex)。

因此, 身体本身就变成了欺骗性的。例如, Rubin 谈论到身体作为背叛者这样的常见表征 (2003年, 第109页)。一旦被贬为纯粹的外表/表象 (appearance), 身体就变成了“错误的 (wrong)”, 因为它不仅承担着“并非注定如此 (not meant to be)”的规范性重担 (normative weight), 而且还承担着错误表述道德式性 (misrepresenting moral sex) 的重担。对 Prosser 来说, 物质身体最终被视为是一种错误表述“内在身体 (inner body)”的第二层皮肤 (1998年, 第82页)。从这个角度来看, 隐藏的身份就变成了身体本身——真实的、隐蔽的身体 (身体形象 (the body image))。人们很自然地认为, 身体形象映射 (mirrors) 了直白的身体 (literal body)。然而, 在错身叙述中, 直白的身体误导了身体形象——也就是说, 身体必须与身体形象保持一致, 而不是相反 (Prosser 1998年, 第85页)。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包覆着的外在物质身体 (即一个人所拥有的) 与内在的、鬼魅的、现象身体 (即一个人本要拥有的; Prosser 1998年, 第85页) 之间的错误表征关系 (a relation of misrepresentation)。

值得注意的是, 具有误导性的物质身体有时被看作是一件衣服 (Prosser 1998年, 第82页)。而手术并不总是被看作是纯粹的更换衣服。相反, 它被看作是衣服的脱落 (shedding)。Prosser写道: “手术把身体剥得精光的, 使它变成了本来的样子” (第83页)。这种对比是醒目竟然人的: 在现实强制的情况下, 存在着从“误导性 (misleading)”隐藏到暴露 (即生殖器验证) 这样的运动变化。而在这个对手术干预的论述中, 我们也有从“误导性”隐藏到暴露 (即性别确认 (gender confirmation)) 这样的运动变化。前者是一种强迫侵犯 (forced violation), 而后者则是一种自愿的剥离束缚自我之物的行为——这是一种“终于自由 (freedom at last)”的时刻, 而不是一种性侵犯 (sexual assault)。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错误被纠正, 感觉阈限的身体 (the liminal body) ——错误表述式衣服或第二层皮肤——就完全消失了, 只剩下与性别呈现保持一致的性化身体 (sexed body)。这意味着错身叙述避免提出身体和身份认同之间更普遍的表征关系。如果这样做, 就需要把所有亲密身体看作为纯粹的呈现, 并把所有的性别身份看作是道德式性

(moral sex) 的来源。相反，归赋给身体的新的对实在性的感识 (the new sense of realness) 要求的是，不把身体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呈现，而是把它看作是道德式性的适当来源。由于这叙述保留了性别呈现和性化身体之间的普遍表征关系的完整，它只保护那些被认为适用于它的人；这也留使其它跨儿者依旧容易受到现实强制的攻击。

例如，一位男至女跨性者 (MTF transsexual) 可能会声明自己一直是个女人 (被困在了错误的身体里)，与此对比，一位男至女易装者 (MTF cross-dresser) 仍然会被恐跨地认为 (transphobically taken as) 实际上是男人打扮成女人，尽管这可能并不能反映这个人自己的自我认同方式 (ways of self-identifying)。易装者和跨性者都可能容易受到现实强制的攻击。但错身叙述需要“真正的跨性者”和“纯粹的易装者”之间形成对比才能发挥作用。这需要将原有的外表-现实对比留在恰当位置，以便于让反抗式外表-现实对比 (resistant appearance-reality contrast) 来扭转它：易装者作为纯粹外表/表象 (mere appearance)，被困在错误身体里的跨性者作为隐藏的现实 (hidden reality)。前者承担了欺骗者-冒充者的重担，以便为“真正的跨性者”提供这种对比：与外表/表象正相反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这不是一个男人打扮成女人，而实际上是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

“易装者 (cross-dresser)”这个词的效力 (force) 是不可低估的。它常常被简化为仅仅等同于“打扮成女人的男人”。而且它被用来对付跨儿者，不管我们自我认同如何。例如，细想下 Chanel Larkin，她是一名非裔美国跨儿女人，为了维持生计转而从事性工作，当她敞开自己的跨儿身份状态 (trans status) 后被一名潜在顾客杀害。新闻媒体将她描述为“易装妓女 (cross-dressing prostitute)¹⁸”和“假扮成女人的男人 (a man posing as a woman)” (Erbentraut, 2010年)。这种表达的效力显然铭刻了一种外表-现实区分 (appearance-reality distinction)，这种区分起到了污名化的作用。

错身叙述之所以让这种表征关系保持完整，部分原因在于它试图排除 (foreclose) 对“女人”等术语的多重 (超脱世俗的 (otherworldly)) 阐释。一旦我们认识到跨儿亚文化以及另样的性别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性别呈现并不意味着生殖器，并且身体以另类方式被编码着亲密界限 (intimacy boundaries)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错身叙述中，性别术语在很

¹⁸ 译者只在这里根据新闻媒体所想表达的意思将“prostitute”翻译为“妓女”，但译者不认为“妓女”、“prostitute”等等这些词有任何贬义。但是词语的重新改造利用 (其性别特指、褒贬色彩等)，是需要在各个层面上交织的社会运动的持续运作才能达成的，译者仍期待着。——译注

大程度上是经由——通过性别呈现来表述 (representing) 生殖器状态 (genital status) 这样的主流实践方式——来阐释的。这在弱版本中是显而易见的，其将女人身份

(womanhood) 与某种特别的基于生殖器的解剖学 (genitally based anatomy) 联系在一起。但这在强版本的叙述中也是如此。因为虽然这个版本确实允许先天的性别身份认同可以单独决定性成员身份 (sex membership)，但这种身份认同必须包括着一种对进行生殖器重建手术来纠正错误的身体的渴望 (desire)，从而使性别呈现和性化身体 (sexed body) 达到适当的一致。

然而恰恰是这种对阐释的多重性 (multiplicity) 的排除 (foreclosure)，使得人们可以从压迫的多重性中抽离出来。例如，考虑下，一些身体重建技术需要高额费用，并且如果不在医疗保健系统的覆盖范围内，大多数跨儿者都无法承受。还要注意的，在性工作占主导地位 (dominant presence) 的那些跨儿女人亚文化中，生殖器重建手术不一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这很可能导致失去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更普遍的是，欲望是由被设想为是可能的事物 (what is envisioned as possible) 以及给定的在地亚文化内被认为有价值的事物 (what is valued within a given local subculture) 两者所形塑的；一些跨儿亚文化根本就不以生殖器重建手术为中心。其它的身体改造 (如隆胸或面部重建) 则更为中心。例如，在一些社群语境下，硅泵输送 (silicon pumping) (将硅直接注入身体) 的使用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¹⁹

由于错身叙述与生殖器重建技术有深刻的联系，因而，这种叙述就像技术一样，会引发人们对阶级差异化的以及种族差异化的 (class- and race-differentiated) 使用机会 (access) 的担忧。错身叙述勾勒出一个标准的目的 (telos) (生殖器重建手术)，而任何不渴望该目的的身份都被判定为是不符合资格的 (ineligible)。因此，它试图通过受霸权阶级、霸权种族和霸权文化改变影响的模态形式 (hegemonic class-, race-, and culture-inflected modalities) 来限制它本身对女人身份 (womanhood) (或男人身份) 的使用 (access)。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错身模型永远无法完全摆脱它试图通过扭转 (reversal) 来对抗的压迫源头。这是因为它的反抗似乎发生在那些压迫跨儿的同一个世界里。一个后果就是，历史上严格的临床标准的制定 (historically rigid clinical criteria instituted)，用以决定一个

¹⁹ 感谢 Alexis Rivera 提出的这一点。

跨儿者 (trans person) 是否是“真正的跨性者 (a true transsexual)” (见 Prosser 1998 年, 第110-12页)。由于问题被界定为身份-身体的错位, 似乎需要一种方法来确定跨儿者是否真的拥有其²⁰所声称的身份。因为如果其不拥有, 危险的是其会被证明是一个性别欺骗者 (gender deceiver) ——也就是说, 纯粹是一个易装者 (merely a cross-dresser)。

毫不奇怪, 临床医生历来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跨儿者, 担忧畏惧 (fearing) 可能出现“欺诈行为 (fraudulence)” (Prosser 1998年, 第111页)。这里的担忧畏惧并不涉及通过性别呈现进行的对生殖器状态 (genital status) 错误表征 (misrepresentation)。相反, 它涉及的是通过伪造叙述 (falsification of narrative) 进行的在治疗情境中的彻底谎言 (outright lying)。这类主题的反复出现绝非偶然。一个被认为不是真正的跨性者 (genuine transsexual) 的跨儿者 (trans person), 无法求助于错身话语的有益干预, 并因而被贬至性别欺骗者的身份状态 (the status of gender deceiver)。也就是说, 一个欺诈性的跨性者 (a fraudulent transsexual) 不过就是一个纯粹的易装者——我们最初的性别欺骗者, 其试图充当为一个真正的跨性者 (pass as a genuine transsexual), 从而得以充当为女人或男人 (pass as a woman or man)。正是这种可能性帮助促使了人们对检测真实性 (detecting authenticity) 的强迫性关注 (obsessive concern), 这由一种假定 (presumption) 所促使的, 其假定认为跨儿者都是潜在的性别欺骗者, 除非被证实并非如此。

在临床领域, 跨儿自传性叙述 (trans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 必然会起到一种身份表征的作用; 跨儿者被期待着以——映射着性别呈现对生殖器状态的期望表征 (mirrors gender presentation's supposed representation of genital status) ——这样的方式, 来讲述TA们所无法获得的性别身份 (inaccessible gender identity) 的真相。这并不令人惊奇。鉴于身体被认为可能错误表述了隐藏的身份, 隐藏的身份现在成了确切位点——也就是道德式性的确切位点 (the locus of moral sex)。奇怪的是, 生殖器状态和身份是相似的, 它们都受制于隐私的界限, 并因此作为隐藏现实而被深深掩藏起来。因此, 当从它们所涉及的强迫性审查 (obsessive scrutiny) 和假定性不信任 (presumptive distrust) 方面来看待时, 这些临床认证程序 (clinical authentication procedures) 开始看起来很像是生殖器验

²⁰ 原文在此处使用的代词是“她 (she)”, 但译者决定使用“其”来模糊特定性别指向, 但不可否认的是, 现阶段恐跨者 (包括全球保守右翼、TERFs (排跨女性主义者) 等) 的绝大部分指控与攻击 (物理上、政策上等方面) 都针对于 trans women。——译注

证程序 (genital verification procedure) 的类同物 (analog) : 虚假的叙述被剥离出来, 以揭露出关于欺骗性的易装者 (the deceptive cross-dresser) 的赤裸真相 (naked truth) 。

这种临床上的不信任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即跨儿者为了获得 (access) 医疗技术的使用而反常地被引导着去伪造自己的历史。Prosser 写道, 这种倾向部分是因为“一些临床医生将跨性者作为一种可疑的文本对待.....而这可能会激起跨性者在一开始就去‘伪造’历史” (1998年, 第111页)。因此, 只要认证程序是为了清除潜在的性别欺骗者而严格确定的, 一种双重束缚就会产生: 要么对临床医生撒谎, 要么就说出真相并被贬入性别欺诈的领域 (the domain of gender fraudulence)。这只是跨儿者面临的原初束缚的衍生变体: 要么充当成异性 (pass as the opposite sex) (即, 作为性别欺骗者), 要么以跨儿的身份出柜并被解读为公开的欺诈行为 (即, 被解读为纯粹的冒充者)。这是一种双输局面 (lose-lose situation), 首先是发生在大街上, 接着是发生在临床医生的办公室里。

虽然错身叙述可能会反转 (reverse) 从而与现实强制相对抗, 但由于它让性别呈现与性化身体之间的表征关系保留完整, 这不仅意味着任何不被认为是困在错误身体的人都将排除在外, 而且现实强制的机制也将在临床医生的办公室里复制。这种虐待将会一直追猎着那些“被困在错误的身体里的人”, 无论TA们走到哪里。

在我看来, 我们需要的是, 对于现实强制之基础 (即, 性别呈现和生殖器之间的整个表征关系) 更加完整的反对立场。而这就需要承认存在多重的意义世界 (multiple worlds of sense), 在这些世界中, “女人 (woman)”等术语具有不同的、反抗式的含义; 在这些世界中, 存在着不同的、反抗式的性别实践。这就允许自我身份认同为男人或女人的跨儿个体与那些身份认同并非如此的跨儿个体一样具有反抗力。在这些情境下, 身份范畴的部署涉及到从根本上背离主流性别实践, 因此改变“女人”和“男人”等术语的含义。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发现到现实强制是一种跨儿压迫,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对身份的主张看作是类同于对“womyn”和“women of color”这样的政治表达方式的使用——这些表达方式被赋予了意义 (又或许是赋意的潜能), 这些意义既生活在对主流意义的反抗对立 (resistant opposition) 中, 同时又是开放的 (open ended) 和多重的。²¹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将跨儿压迫和反抗建立

²¹ 关于“womyn”, 见 Scheman (1997年, 第141页); 关于“women of color”, 见 Lugones (2003年, 第84页)。

(grounding) 在跨性别模型 (transgender model) 这样的基础上——这模型需要把跨儿者 (trans people) 的反抗潜能定位在二元论之外，我们其实已经被困在了错误的理论里。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eauvoir, Simone de. 1952. *The Second Sex*. Ed. and trans. H. M. Parshley . New York: Random House.

Bettcher, Talia Mae. 2006a. "Appearance, Reality and Gender Deception: Reflections on Transphobic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Pretence." In *Violence, Victims, Justifications: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ed. Felix 6 Murchadha, 175-200. Oxford: Peter Lang.

— — . 2006b. "Understanding Transphobia: Authenticity and Sexual Abuse." In *Transforming Feminisms: Transfeminist Voices Speak Out*, ed. Krista ScottDixon, 203-10. Toronto: Sumach.

— — . 2007. "Evil Deceivers and Make-Believers: Transphobic Viol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Hypatia* 22(3):43---65.

— — . 2012a. "Full-Frontal Morality: The Naked Truth about Gender." *Hypatia* 27(2):319-37.

— — . 2012b. "Trans Women and the Meaning of 'Woman.'" In *The Philosophy of Sex: Contemporary Readings*, ed. Nicholas Power, Raja Halwani, and Alan Soble, 233-50. 6th 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Bornstein, Kate.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Routledge.

Cooke, Suzan. 2007. "Goodbye to Transgender and All That." *TS-Si*, May 7. <http://ts-si.org/guest-columns/2347-good-bye-to-transgender-and-all-that>.

Erbentraut, Joseph. 2010. "Transgender Woman Murdered on Milwaukee Street." *Edge*, May 20. <http://www.edgeboston.com/index.php?ch=newss&sc2=news&sc3=&id=105882>.

Fausto-Sterling, Anne. 2000. *Sexing the Body: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New York: Basic.

Feinberg, Leslie. 1993. *Stone Butch Blues: A Novel*. Ithaca, NY: Firebrand.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Grant, Jaime M., Lisa A. Mottet, and Justin Tanis. 2011. "Executive Summary: Injustice at Every Turn: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Discrimination Survey." With Jack Harrison, Jody L. Herman, and Mara Keisling. Report,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and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 Washington, DC. http://transequality.org/PDFs/NTDS_Exec_Summary.pdf.

Hale, C. Jacob. 1997. "Leatherdyke Boys and Their Daddies: How to Have Sex without Women or Men." *Social Text* 52/53 15(3/4):223-36.

Kessler, Suzanne J., and Wendy McKenna. 1978. *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New York: Wiley.

Koyama, Emi. 2003. "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 In *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ed. Rory Dicker and Alison Piepmeier, 244--59.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Lewis, Vek. 2008. "Of Lady-Killers and 'Men Dressed as Women': Soap Opera, Scapegoats and the Mexico City Police Department." *Portal* 5(1):1-28. <http://epress.lib.uts.edu.au/journals/index.php/portal/article/view/480/594>.

Lugones, Maria. 2003. *Pilgrimages/Peregrinajes: Theorizing Coalition against Multiple Oppress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MacKenzie, Gordene, and Mary Marcel. 2009. "Media Coverage of the Murder of U.S. Transwomen of Color." In *Local Violence, Global Media: Feminist Analyses of Gendered Representations*, ed. Lisa M. Cuklanz and Sujata Moorti, 79-106. New York: Peter Lang.

Meyerowitz, Joanne. 2002. *How Sex Changed: A History of Trans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amaste, Viviane K 2000. "'Tragic Misreadings': Queer Theory 's Erasure of Transgender Subjectivity." In *Invisible Lives: The Erasure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 9-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05. *Sex Change, Social Change: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stitutions, and Imperialism*. Toronto: Women's Press.

Nemoto, Tooru, Don Operario, JoAnne Keatley, and David Villegas. 2004. "Social Context of HIV Risk Behaviours among Male-to-Female Transgenders of Colour." *AIDS Care* 16(6):724-35.

O'Bryan, Will. 2005. "Killer Sentenced in Transgender Murder Case." *Metro Weekly*, December 22. <http://www.metroweekly.com/news/?ak=1905>.

Prosser, Jay. 1998. *Second Skins: The Body Narratives of Transsex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ubin, Henry. 2003. *Self-Made Men: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among Transsexual Men*. Nashville, T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Salamon, Gayle. 2010. *Assuming a Body: Transgender and Rhetorics of Materi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eman, Naomi. 1997. "Queering the Center by Centering the Queer: Reflections on Transsexuals and Secular Jews." In *Feminists Rethink the Self*, ed. Diana Tietjens Meyers, 124--62. Boulder, CO: Westview.

Schilt, Kristen, and Laurel Westbrook. 2009. "Doing Gender, Doing Heteronormativity: 'Gender Normals,' Transgender People, and the Social Maintenance of Heterosexuality." *Gender and Society* 23(4):440-64.

Serano, Julia, 2007. *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 Emeryville, CA: Seal.

Stone, Sandy.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In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 Julia Epstein and Kristina Straub, 280-304. New York: Routledge.

West, Candace, and Sarah Fenstermaker. 1995. "Doing Difference." *Gender and Society* 9(1):8-37.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2):125-51.